

## 論《江表傳》中的南方立場與東吳意象

王文進\*

### 摘要

《江表傳》是裴松之《三國志注》在其所引用一百五十多種史籍中極為重要的文獻。就引用的數量而言高達一百二十幾條，僅次於魚豢《魏略》近二百二十條、王沈《魏書》的一百九十幾條，就排列次序而言已名列第三。但更重要的是《江表傳》所記載的人物歷史事件均以南方東吳為主，並強烈顯示其以東吳立場的敘史角度，最明顯的如描述赤壁之戰的過程與主導勝負之關鍵，均特別強調孫吳將帥的驍勇及謀略；或者在孫、劉兩方爭奪荊州時，刻意強化劉備之無能與貪婪，使得本書所出現的三國人物與陳壽《三國志》或明清時期的小說《三國演義》所塑造之歷史形象，產生很大之落差，是以《江表傳》一書對於三國史的研究有極關鍵性之地位，若將其與代表曹魏立場的魚豢《魏略》及王沈《魏書》相互對照辯證，對三國史的研究將可開拓出嶄新的視角。

關鍵詞：《江表傳》、孫吳、赤壁之戰、應運東南、借荊州

---

\*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The Discussion on the Stance of the South and Dong-Wu Imagery in ‘Jiang-Biao Biography’

Wang Wen-J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 Abstract

Among the over one hundred and fifty historical records quoted by Pei Song in the “Annot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Jiang-Biao Biography”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frequent cited literatures. It was cited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imes, secondary to “Wei Strategy” by Yu-Huan, two-hundred and twenty times, and “Wei Manual” by Wang Shen which was one hundred and ninety times. More importantly, the characters and historical events described in Jiang-Biao Biography, which generally focused on the Dong-Wu of South, had strongly suggested the Dongwu-based stance in the historical elaboration. The most obvious example would b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Battle of Redcliff and the crucial point for leading to the outcome of winning and losing. Both of them described particularly the bravery and strategic ability of the Sun Wu generals. Moreover, it emphasized Liu Bei’s inability and greed during the Jingzhou Strife in the three-kingdom history. As a result, the Three-country characters appeared in this book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ompared to the historical figures shaped up in Chen-Shou’s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iang-Biao Biography” is important for the study of three-kingdom history. It can be used to triangulate with Yu-Huan’s “Wei Strategy” and Wang-Shen’s “Wei Manual” for the purpose of developing a brand-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ree-Kingdom.

**Keywords: Yu-Pu's "Jiang-Biao Biography", Sunwu, Battle of Redcliff, support to Wu and be enemy to Shu, the utilization of southeast**



# 論《江表傳》中的南方立場與東吳意象\*

王文進

## 一、前言

當陳壽（233-297）於太康年間（280-290）撰定《三國志》以後，並沒有減緩有關三國史的百家爭鳴。從劉宋（420-478）史家裴松之（372-451）奉詔編纂《三國志注》（後文簡稱《裴注》），其中所保存的 157 種史部書目，即間接透露出陳壽著史時所面臨史料紛雜的處境。《裴注》引用的史著進一步觀察大致可區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陳壽寫《三國志》前就見到的書，但卻對其中部分內容棄而不用或加以刪節，極可能隱含著陳壽取捨史料背後的史觀；另一類是在《三國志》完成以後才陸續出現的史料文獻，這類史料在三國學研究上的意義則可視為對《陳志》原有結構的挑戰與重組。而本文所研究的主要文獻——西晉（266-316）虞溥《江表傳》，正屬於後者。其在《裴注》中共徵引 121 條，係《裴注》引用諸書之排行榜上名列第三，僅次於曹魏（220-265）魚豢《魏略》與《典略》之 219 條<sup>1</sup>、王沈《魏書》190 條<sup>2</sup>，而稍多於東吳（229-280）韋昭（204-273）《吳書》115 條、西晉張勃《吳錄》109 條、東晉（317-420）孫盛（307-378）<sup>3</sup> 95 條<sup>4</sup>、西晉郭頒《世語》84 條<sup>5</sup>、以及習

\* 本文為國科會多年期研究計畫：〈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南北文化立場之探究 NSC97-2410-H259-034-MY3〉的成果之一。曾於 2013 年 6 月於國立東華大學所舉辦之「奇萊論學——第一屆臺大、成大、東華三校論壇學術研討會：古典與新潮」首次宣讀，於修改後投稿又再獲兩位審查委員寶貴意見，更助本文論點臻於完善，謹此深表感激之意。

<sup>1</sup> 《魏略》一書雖晚至晉初脫稿，但主要是在曹魏時期所撰寫的。見羅秉英：〈《魏略》的上限和下限——兼說《魏略》成書年代〉，《治史心裁：羅秉英文集》（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5），頁 19-28。

<sup>2</sup> 見拙著：〈論王沈《魏書》對三國史的詮釋立場〉，發表於「第 14 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12.5.4-5）。

<sup>3</sup> 王建國：〈孫盛若干生平事迹及著述考辨〉，《洛陽師範學院學報》3（2006），頁 71-73。

<sup>4</sup> 孫盛著作甚多，裴松之的主要徵引《魏氏春秋》55 條、《晉陽秋》20 條。

鑿齒（328-412）的《漢晉春秋》與《襄陽記》分別為 67 及 15 條，共計 82 條。<sup>6</sup>但無論就裴松之的自注，或者是其徵引的諸多史籍議論<sup>7</sup>，皆有助於後人據此分別出各國對峙下的「敵國傳聞」，或者是緬懷家邦的「專美之辭」，呈現出見聞各異、爭勝抑揚的三國爭霸史。<sup>8</sup>本文即擬據此探討出現於陳壽之後的《江表傳》，所提出與《三國志》不同立場的三國史觀，最主要乃環繞在對吳國君主之褒美，及描述赤壁之戰前後孫、劉聯合抗曹的南北之爭，及孫、劉聯盟之間亦友亦敵的複雜關係。

## 二、《江表傳》的性質及所謂「吳人欲專美之詞」

### （一）「江表」在三國史語境中的意義

「江表」一詞若據現存文獻考察，華歆所言應是目前最早的記錄，《三國志注》引胡冲《吳歷》云：

孫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歆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

<sup>5</sup> 以上有關《裴注》引書之數據，除本人統計外，另可參見余志挺：《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sup>6</sup> 見拙著：〈習鑿齒與諸葛亮神話之締造〉，《臺大中文學報》38（2012.9），頁 71-120。另有關孫盛之生卒年據吳直雄之考辨。參氏著：〈習鑿齒及其相關問題考辨〉，《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0：4（2009.7），頁 74-80。

<sup>7</sup> 深加讚美者亦有之，如李慈銘（1829-1894）即云：「裴松之博采異聞，而多所折衷，在諸史注中為最善，注家亦絕少此體。」清·李慈銘著，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冊上（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95。

<sup>8</sup> 李純蛟〈《三國志》的史學〉：「《三國志》以魏帝為本紀，表明有過漢—魏—晉這個統緒，在形式上迎合了當局爭正統的政治需要；但是從實質上講，《三國志》並不承認這個統緒是完整的。……漢末以來的形勢，就是從多極政治，最後變為三極政治的。魏、蜀、吳三國，實際上就是三個割據天下，各自獨立、互不統屬的政治實體和政治中心。……當時一些史家，如《魏書》作者王沈、《魏略》作者魚豢、《吳書》作者韋昭等，由於堅持從維護一己的割據集團的利益出發，……因而不可避免出現存己廢彼，導致三國史記載的偏缺不全。」見氏著：《《三國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頁 66-67。

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sup>9</sup>

華歆是漢末名士，曾與邴原、管寧並稱一「龍」，而獨佔龍頭，足見其於當世名聲之高。<sup>10</sup>據《三國志》記載，興平元年（194）馬日磾（？-194）受詔持節招撫天下，乃任其為豫章太守，然《後漢書》卷9《孝獻帝紀》於此年末曰：「是歲，揚州刺史劉繇與袁術將孫策戰于曲阿，繇軍敗績，孫策遂據江東。」<sup>11</sup>一方面透露孫策（175-200）已經完全控制了包含豫章的揚州，直扼江東之地；另外則可知華歆所謂的「江表」在漢末時期，其義已專指長江以南的區域。然華歆的語氣中似仍充滿對中原的留戀，極思北歸，故言及「江表」的語氣反而疏遠冷淡。爾後當孫氏政權相形穩固後，「江表」一詞的意義逐漸提升至南北爭奪的焦距：如阮瑀（165-212）為曹操（155-220）作書與孫權（182-252）時即曰：「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効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sup>12</sup>曹操目的在勸服孫權歸順，故此「江表」的用法顯然已非華歆時期的化外之地，而是帶有「國之重鎮」之意義，並充滿政治象徵的王權統轄宣示：前者如韋昭《吳書》所載顧徽出使北地：

公（曹操）具問（吳）境內消息，（顧）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為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遣還。<sup>13</sup>

曹操的盤算顧徽心知肚明，故其對江表兵強馬壯的描述實也意味警告曹營不要輕舉妄動，「江表消息」在此便不僅具戰略要義，更意味著孫氏政權之象徵。而後者則如

<sup>9</sup> 《三國志》卷13《魏書·華歆傳注》。見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402。而關於《吳歷》的成書時間，依陳壽於《三國志》卷65《吳書·王樓賀韋華傳》的「評曰」曾引用胡冲之語可知，此書於陳壽生前即已完成。以下從省為《三國志》。

<sup>10</sup> 《三國志》卷13《魏書·華歆傳注》引曹魏·魚豢《魏略》曰：「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見《三國志》，頁402。

<sup>11</sup> 南朝宋·范曄（398-445）撰，唐·李賢（651-684）等注：《後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377。以下從省為《後漢書》。

<sup>12</sup> 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見南朝梁·蕭統（501-531）編，唐·李善注，清·胡克家（1757-1816）考異，李培南等點校：《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1892。

<sup>13</sup> 《三國志》卷52《吳書·顧雍傳注》。見《三國志》，頁1228。

同曹丕（187-226）在黃初3年（222）五月公告施行的政區劃分：

以荆、揚、江表八郡為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諸郡為郢州。<sup>14</sup>

但這僅僅是政治宣示罷了，畢竟曹魏從未佔有江表之地，但可確定的是「江表」一詞最終演變為東吳政權之代名詞。<sup>15</sup>

## （二）虞溥與《江表傳》之間的關係

而編撰《江表傳》的虞溥，據《晉書》本傳可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尚書令衛瓘、尚書褚詵並器重之。……除鄱陽內史。……溥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祕書。<sup>16</sup>

虞溥能擔任鄱陽內史只有在西晉統一全國後，即太康元年（280）以後，而《晉書》卷24《職官志》曰：「郡皆置太守。河南郡，京師所在，則曰尹。王國以內史掌太守之任。」<sup>17</sup>則可知鄱陽郡屬於西晉分封諸侯王之食邑，但至太康10年（290）才有淮南王司馬允（272-300）「十一月鎮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sup>18</sup>且《晉書》卷1《武帝紀》亦載：「太康十年十一月，改諸王國相為內史。」<sup>19</sup>故可見虞溥至早也需在太康10年十一月以後才可能擔任鄱陽內史，因此《江表傳》絕對晚於陳壽撰於太康元年至太康10年間（280-290）的《三國志》。且此書實乃虞溥之子虞勃於西晉過江後才上呈朝廷，故其公開於世的時間距《三國志》的成書年代已距三十年左右。而虞溥任鄱陽內史所負有：「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

<sup>14</sup> 《三國志》卷2《魏書·文帝紀》。見《三國志》，頁80。

<sup>15</sup> 後世史籍對東吳政權尚有「江東」、「江左」之稱代，然本文以研究《江表傳》為主，故將視角鎖定於「江表」一詞，以集中探究《江表傳》中的東吳意象。

<sup>16</sup> 《晉書》卷82《虞溥傳》。見唐·房玄齡（578-648）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2138-2139。以下從省為《晉書》。

<sup>17</sup> 《晉書》，頁746。

<sup>18</sup> 清·萬斯同（1638-1702）：《晉方鎮年表》。收入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冊3（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3390。

<sup>19</sup> 《晉書》，頁79。



所當勤恤」<sup>20</sup>之重責大任，即為其編撰《江表傳》之前提，據《宋書》卷 40《百官下》即曰：「漢制，歲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眾事，謂之階簿。」<sup>21</sup>上計吏須每年上繳地方圖經簿籍等資料，《隋書·經籍志》即於地理類小序云：「(漢)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sup>22</sup>是以虞溥編撰《江表傳》實與漢代以來的地方制度關係密切。

而《江表傳》的內容偏向孫吳立場的現象，也意味著虞溥實保存著江東地區人士話語之原貌，而這正是其治理江東時最佳的參考資料，然在《江表傳》中卻又存在因北人立場而尊曹操為「曹公」之筆法，也正顯示出虞溥身為晉史的敘史觀點。此一既以北方中原為正統，卻又保留南方政權話語原貌之雙重敘史結構，應該也與虞溥本身所具有的《春秋》學養有關<sup>23</sup>，雖然劉知幾（661-721）曾認為《江表傳》屬於「偽政權」之史：

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句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為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眾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sup>24</sup>

故其並不認同虞溥《江表傳》的價值，不過劉知幾倒是透露古史所存在的眾說紛紜現象，正揭示出本文所欲探究三國史複雜轉折與耐人尋味之處。

這種各說各話的具體例證，在《江表傳》所記載赤壁戰前孫、劉聯盟之各自表述中即已具體顯示：孫、劉二人在抗曹的共同目標下，確實產生協同聯防的盟約。東漢獻帝建安 13 年（208）冬諸葛亮前往遊說孫權（182-252）：

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

<sup>20</sup> 《風俗通義》卷 3《愆禮》。見東漢·應劭（153-196）撰，王利器（1912-1998）校注：《風俗通義校注》（臺北：明文書局，1988），頁 147。

<sup>21</sup> 南朝梁·沈約（441-513）：《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256。

<sup>22</sup> 《隋書》卷 33《經籍二》。參唐·魏徵（580-643）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987-988。

<sup>23</sup> 承蒙審查人提示虞溥具有的春秋學養背景，並考慮其與《江表傳》史筆之間的聯繫，特此誌謝。

<sup>24</sup> 《史通》卷 5《因習》。見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1679-1762）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128。

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徧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sup>25</sup>

後來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把《陳志》記述諸葛亮這段短短的遊說之辭，鋪演成長達兩回的故事：「諸葛亮舌戰群儒 魯子敬力排眾議」、「孔明用智激周瑜 孫權決計破曹操」<sup>26</sup>，從回目中可知羅貫中把孫、劉聯盟之功全歸於孔明，但若回溯《陳志》與《裴注》的記載，卻可發現孫、劉聯盟的過程實相對複雜。如在《三國志·吳書》中，魯肅（172-217）早已對孫權分析聯合劉備以抗曹操的戰略優勢：「夫荊楚與國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sup>27</sup>隨後魯肅即銜命西渡荊州連結劉備，據《江表傳》所記可知：

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令與備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乎？」備大喜，進住鄂

<sup>25</sup> 《三國志》卷35《蜀書·諸葛亮傳》。見《三國志》，頁915。

<sup>26</sup>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批評，孟昭連等校點：《三國演義》（長沙：岳麓書社，2006），第43-44回，頁337-353。

<sup>27</sup> 《三國志》卷54《吳書·魯肅傳》。見《三國志》，頁1269。

縣，即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sup>28</sup>

上二則史料顯示出魯肅推動孫、劉聯盟的關鍵地位，但前者揭露出魯肅的深謀遠慮，後者則暗諷劉備之驚慌失措，兩份文獻顯係皆以揚贊孫吳之功為論史立場。故比較〈諸葛亮傳〉、〈魯肅傳〉、與《江表傳》三者對孫、劉聯盟的不同論述，正可見三國史真相撲朔迷離之特性，再加上日後《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推波助瀾，逐漸構築出獨尊諸葛亮，卻使其他三國人物如魯肅等人，風采失色而退居二線角色。

上列三種文獻的論述差異，正顯示出裴松之《三國志注》搜羅各種史料所隱含的珍貴價值以及眾說紛陳的景況。若再細分《江表傳》於《裴注》中的分布區塊可知：在共引 121 條中，光是《三國志·吳書》的部分就佔了 114 條，而《三國志·魏書》與《三國志·蜀書》則分別只有 2 條與 5 條，所以若將其置於三國時代三足鼎立之架構下，便如孫盛所論此書具有「吳人專美之詞」<sup>29</sup>的性質，而何焯(1661-1722)也認為《江表傳》有「欲專赤壁之功」<sup>30</sup>之嫌，王懋竑(1668-1741)亦曰：「《江表傳》所云以地給備及備借荊州數郡之語，皆傳聞之妄，不足據也。」<sup>31</sup>足知歷來譏貶《江表傳》的評價，實皆承自東晉孫盛的判斷。但此語卻反而包含著另一層意義：即《江表傳》實保存著東吳士民具南方立場的原始言論紀錄，也意味著虞溥編撰本書對東吳史觀具有相當高的補充價值。職此之故，本文將《江表傳》置於《裴注》「補闕」、「備異」及「保存」南方史料的史學結構中<sup>32</sup>，討論該書如何流露出孫皓亡國後，「江表」遺民對故國舊主與英雄人物的追憶及詠嘆，以及其與《魏書》、《魏

<sup>28</sup> 《三國志》卷 32《蜀書·先主傳注》引虞溥《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878-879。

<sup>29</sup> 《三國志》卷 32《蜀書·先主傳注》引孫盛曰：「《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見《三國志》，頁 879。

<sup>30</sup> 清·何焯撰，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冊中（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460。

<sup>31</sup> 盧弼(1876-1967)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2351。以下從省為《三國志集解》。

<sup>32</sup> 如繆越(1904-1995)〈陳壽與《三國志》〉：「裴注體例，不在於訓詁名物的解釋，而在於史料的補闕與糾謬。」見氏著：《讀史存稿》（香港：三聯書店，1978），頁 18。而劉節(1901-1977)亦云：「裴注所引史籍頗多，也保留了許多古史資料。」參氏著：《中國史學史稿》（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頁 80。另可參遼耀東(1933-2006)：《魏晉史學的思想及社會基礎》（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 348-351。最新研究可參考陳楠：〈淺論《三國志注》的歷史文獻學價值〉，《山東圖書館季刊》3（2008.9），頁 91-95。

略》等以北方為重心的史籍之史觀差異。

### 三、《江表傳》中對孫氏江東霸業的頌揚

#### (一) 對孫氏父子創霸江東的頌揚

孫氏政權崛起於漢末，實與孫堅（155-191）參加討伐董卓（?-192）之役有關。然若就當時文獻的表述看來，孫堅本為一無名之士，甚至為地痞流氓之徒<sup>33</sup>，如西晉樂資《山陽公載記》所載董卓之言：

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卓曰：「堅實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sup>34</sup>

董卓指出孫堅「小戇」之人格特質以突出其痴愚、急躁、剛直之性格<sup>35</sup>，故陳壽在《吳夫人傳》中便記載著孫堅強勢娶親的故事：「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慚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sup>36</sup>可見吳家顯然是迫於無奈而許婚。<sup>37</sup>而陳壽對於孫堅的記載同樣出現負面之形象，如其殘殺名士的暴行：

<sup>33</sup> 王永平：〈論孫權父子之「輕脫」〉。參氏著：《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4。

<sup>34</sup> 《三國志》卷46《吳書·孫破虜傳注》引《山陽公載記》。見《三國志》，頁1099。

<sup>35</sup> 《荀子》卷19《大略》：「悍戇好鬥，似勇而非。」見清·王先謙（1842-1917）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冊下（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515。

<sup>36</sup> 《三國志》卷50《吳書·孫破虜吳夫人傳》。見《三國志》，頁1195。而方詩銘解釋「輕狡」為：「輕狡屬於無行，用今天的語言來說即是無賴。……輕狡還不是一般的無形，而是屬於打家劫舍的綠林強盜行徑。十分明顯，孫堅這個輕狡之徒，當然為當時富春人們所不齒，也為人們所畏懼。」見氏著：《方詩銘論三國人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112-113。

<sup>37</sup> 陳昌明教授曾於三校會議時提醒，「如有不遇」四字係暗示孫堅並非一無可取之徒，是以本段據昌明兄提示，將原本措辭較強烈之處稍作修正，特此誌謝。

南陽太守張咨聞（孫堅）軍至，晏然自若。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sup>38</sup>

這次事件另見《零陵先賢傳》的記載：「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劉）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sup>39</sup>而《獻帝春秋》也說：「袁術表（孫）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張）咨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咨遂不與。」<sup>40</sup>上述三種資料使我們對此事拼湊出較完整的認知：張咨雖是董卓用來矯情天下而舉任的名士之一<sup>41</sup>，然其諮綱紀以行政之舉措，顯示其法令嚴明的黨錮遺風<sup>42</sup>，由《零陵先賢傳》的記載可知，南陽百姓對劉巴之父劉祥協同孫堅斬殺張咨的不滿，也對照出零陵地方勢力間的爭鬥實況；而《獻帝春秋》的史料更指出孫堅不但妄殺朝廷命官，更視國家法紀為無物之跋扈。縱使《零陵先賢傳》具有強烈偏頗的地方意識<sup>43</sup>，《獻帝春秋》或有「穢雜虛謬」<sup>44</sup>之嫌，然由其頌揚張咨嚴守綱紀、不畏孫堅兵眾威脅之狀，亦

<sup>38</sup>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破虜傳》。見《三國志》，頁 1096。

<sup>39</sup> 《三國志》卷 39《蜀書·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見《三國志》，頁 980。

<sup>40</sup>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破虜傳注》引《獻帝春秋》。見《三國志》，頁 1097。

<sup>41</sup> 《後漢書》卷 72《董卓傳》：「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陳留孔伋為豫州刺史，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見《後漢書》，頁 2326。

<sup>42</sup> 《後漢書》卷 67《黨錮列傳序》：「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見《後漢書》，頁 2185。

<sup>43</sup> 清·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謂：「《三國志注》所引《零陵先賢傳》皆記劉、曹時事。《藝文類聚·祥瑞部》引周不疑作《白雀頌》亦係魏人，惟《水經·湘水注》鄭產為白土耆夫上言除民口錢事，乃漢末先賢。」則可知《零陵先賢傳》的內容應該都還屬於魏、蜀時期。見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冊 4，頁 5346-5347。而盧弼指出：「陳運溶輯本《零陵先賢傳》一卷，尚有漢李融一人。」李融雖已不可考，然從章、盧二人所述，則可知此書應作於三國時代，且冠以「零陵」亦可推測作者背景，及此書所富含的地方意識。見《三國志集解》，頁 766-767。

<sup>44</sup> 《三國志》卷 36《蜀書·馬超傳注》。見《三國志》，頁 947。然從清·姚振宗（1842-1906）考證：「曄祖迪與張紘過江當在獻帝初年，下至吳亡，凡九十餘年。曄生長於吳，故所作多傳聞異詞，其

可從中察見諸書批判孫堅之立場。

但在《江表傳》中，卻出現吳人對孫堅創霸的追頌。如初平元年（190）董卓挾漢獻帝（189-220）遷都長安，並對洛陽進行焦土政策<sup>45</sup>，當孫堅抵達洛陽時：「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sup>46</sup>眼見歷代漢陵慘遭西涼豺虎掘毀<sup>47</sup>，使其有感而涕，《江表傳》實刻意塑造孫堅為一忠勇為國的肝膽之士，連裴松之也認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sup>48</sup>而這種形象正是《江表傳》不斷強化的觀點，如：「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sup>49</sup>其受民眾愛戴之言便與《陳志》所言的「輕狡」形象差異甚大，《江表傳》不僅強調孫堅政績卓著，且更對鄉里親故視如己出，流露出視民如傷的悲憫情懷，完全扭轉北方文獻或《陳志》中的負面記載，而美化其創霸江東的種種傳說。

而《陳志》中曾載錄袁術（?-199）對孫策之好評：「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sup>50</sup>甚至還提及雙方之間的合作：「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sup>51</sup>但就袁術在漢末「奢淫放肆，榮不終己」<sup>52</sup>之自取滅亡的形象，以及興平2年僭位稱帝之舉動<sup>53</sup>，顯示陳壽隱然將孫策視為袁術竊國集團之成員，並刻意忽略孫策與袁術之間恩怨情仇的交涉過程，但這些記錄卻都在《江表傳》中重現：

---

人或未嘗入晉。」則可確知袁術本北方士族，江東僅為其避難之所。見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冊4，頁5259。

<sup>45</sup> 《三國志》卷6《魏書·董卓傳》：「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裴注》又引司馬彪（243-306）《續漢書》曰：「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掃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見《三國志》，頁176-178。

<sup>46</sup> 《三國志》卷46《吳書·孫破虜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1099。

<sup>47</sup> 《三國志》卷46《吳書·孫破虜傳注》曰：「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脩諸陵，瓶塞卓所掘發。」見《三國志》，頁1097。

<sup>48</sup> 《三國志》卷46《吳書·孫破虜傳注》引裴松之曰。見《三國志》，頁1100。

<sup>49</sup> 《三國志》卷46《吳書·孫破虜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1094。

<sup>50</sup> 《三國志》卷46《吳書·孫討逆傳》。見《三國志》，頁1102。

<sup>51</sup> 《三國志》卷46《吳書·孫討逆傳》。見《三國志》，頁1101。

<sup>52</sup> 《三國志》卷6《魏書·董二袁劉傳》「評曰」。見《三國志》，頁216。

<sup>53</sup> 《三國志》卷6《魏書·袁術傳》：「興平二年冬，……用河內張烟之符命，遂僭號。」見《三國志》，頁209。

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為丹楊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楊依舅，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sup>54</sup>

此事發生在興平元年，前一年即初平4年正月，孫堅遭黃祖部隊暗殺身亡，而從《江表傳》可知當時孫堅的將士隨即遭到袁術接管，而孫策登門哀求袁術歸還其父舊部卻遭拒絕：「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sup>55</sup>袁術顯然意圖令孫策自生自滅，並想獨佔這支現成的武裝勢力。故從《江表傳》所述可知孫策根本與袁術為敵對勢力，袁術不但對孫策處處掣肘，更企圖消滅孫氏家族的勢力，是以當袁術在興平2年稱帝遭到天下諸路軍閥之圍剿時，孫策亦為義軍成員，故《陳志》在本傳中雖提到：「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sup>56</sup>但此語卻完全無法澄清孫策與袁術之間曖昧的利害關係。但藉《江表傳》所錄漢獻帝之詔書，反而使孫、袁兩代間的敵對關係真相大白：

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誦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sup>57</sup>

此〈詔〉為漢廷趁袁術與孫策之隙，搶先頒布任命孫策為會稽太守之令，不僅使孫策順理成章接管其父舊部，更收編其武裝勢力作為對抗袁術的籌碼，然而《江表傳》的描述實更寓有視孫策為忠漢耿耿的討逆大將，故「求福不回」一語即完全湮沒了孫策與袁術之間曾有過利益交涉的記錄。然而這些對孫策形象有利的朝廷資料，卻

<sup>54</sup> 《三國志》卷46《吳書·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1103。

<sup>55</sup> 《三國志》卷46《吳書·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1103。

<sup>56</sup> 《三國志》卷46《吳書·孫討逆傳》。見《三國志》，頁1104。

<sup>57</sup> 《三國志》卷46《吳書·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1107。

在陳壽編撰《三國志》時遭到忽略，與陳壽所言孫策「輕挑果躁」<sup>58</sup>之莽撞形象相比，《江表傳》中的孫策反而嚴謹穩重：

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sup>59</sup>

或足智多謀：

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復合眾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于茲鄉策。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sup>60</sup>

甚至對太史慈之識人之明：

策初遣（太史）慈，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謀，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

<sup>58</sup> 《三國志》卷46《吳書·孫破虜討逆傳》「評曰」。見《三國志》，頁1113。

<sup>59</sup> 《三國志》卷46《吳書·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1104-1105。

<sup>60</sup> 《三國志》卷46《吳書·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頁1103-1104。



議者乃始服。<sup>61</sup>

日後毛宗崗《三國志演義》還發展出第十五回：「太史慈酣鬥小霸王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的故事<sup>62</sup>，在在顯示出《江表傳》中的孫策形象與陳壽《三國志》中簡略枯燥之不同。

而《江表傳》中溢美孫權的資料則更多，如謂其具異相：

堅為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sup>63</sup>

此事還可互證於劉琬之語：「漢以策遠脩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恆，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sup>64</sup>足見孫權所具有之天命真子之象徵，相較於此，陳壽僅簡短地說：「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楊羨長。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sup>65</sup>與《江表傳》的袒吳立場相比，其他文獻的記載則替我們揭示了孫權較為負面的印象，如魚豢指孫權背信忘義<sup>66</sup>，陳壽稱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sup>67</sup>孫盛也謂：「權年老志衰，讒臣在側，廢適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sup>68</sup>但在《江表傳》中，孫權的形象卻是好學之君：「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

<sup>61</sup>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101。

<sup>62</sup> 嘉靖本羅貫中回目僅言「太史慈酣鬥小霸王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係毛宗崗修訂後之回目。

<sup>63</sup>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115。

<sup>64</sup>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見《三國志》，頁 1115。

<sup>65</sup>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見《三國志》，頁 1115。

<sup>66</sup>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注》引《魏略》記載孫權欺騙皓周出使魏國，且應允魏文帝（220-226）將遣子為質：「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得其真，而權但華偽，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帝既彰權罪，周亦見疎遠，終身不用。」見《三國志》，頁 1129。

<sup>67</sup>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評曰」。見《三國志》，頁 1149。

<sup>68</sup>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注》引孫盛曰。見《三國志》，頁 1148-1149。

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sup>69</sup>足見吳人對孫權學識及人格之肯定，陳壽在《吳主傳》中即載：「（孫權）遣都尉趙咨使魏。魏（文）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sup>70</sup>所謂的「雄略」，即韋昭《吳書》所云：「權為吳王，擢（趙咨）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答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藉採奇異，不效諸生。』」<sup>71</sup>顯示出吳人在亡國前後對其國主不遺餘力之頌揚態度的一致性。

而協助孫權穩定政權的功臣張昭（156-236）、張紘，《江表傳》也記錄著其君臣和諧之景象：

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張）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sup>72</sup>

不過就《陳志》記載可知，孫權與張昭之間時或有爭執不合：如孫權喜畋獵，置張昭之勸如罔聞<sup>73</sup>，甚至飲酒作樂亦不知節制<sup>74</sup>，處處流露出張昭與孫權之間君臣的衝突與矛盾，而就《陳志》的描述可知，孫、張之過節應不僅如過去學者所云為政爭黨同伐異所致<sup>75</sup>；實則陳壽在運筆之際，已經藉由蜀國先主劉備與孔明君臣間如魚得水<sup>76</sup>，以及白帝託孤君臣相知之典範，對孫、張二人扞格不合形成對照效果。而《江表傳》中則不時出現孫權納諫自省，或深謀遠慮等正面形象，《陳志》與其說「銓

<sup>69</sup> 《三國志》卷 54《吳書·呂蒙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275。

<sup>70</sup>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見《三國志》，頁 1123。

<sup>71</sup>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注》引韋昭《吳書》。見《三國志》，頁 1123-1124。

<sup>72</sup> 《三國志》卷 53《吳書·張紘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244。

<sup>73</sup> 《三國志》卷 52《吳書·張昭傳》：「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見《三國志》，頁 1220。

<sup>74</sup> 《三國志》卷 52《吳書·張昭傳》：「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見《三國志》，頁 1221。

<sup>75</sup> 王永平：〈張昭政治地位之變遷及其與孫權衝突之原因考論〉，《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頁 64。

<sup>76</sup> 《三國志》卷 35《蜀書·諸葛亮傳》：「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見《三國志》，頁 913。

敘可觀，事多審正」<sup>77</sup>，毋寧說是陳壽刪棄了許多有利於孫權相關之史料不用，而敘錄之史料又多為對孫權不利之局面，由此也可見陳壽著史之預設立場。

## （二）「應運東南」與孫氏政權之認同

建安 13 年（208）曹操南征荊州之時，孫權的從兄孫賁曾試圖向其投誠：「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為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sup>78</sup>曹操與孫家聯姻出於建安元年，《陳志》云：「是時，袁紹方疆，而策并江夏，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彰取賁女。」<sup>79</sup>這種立於政治利益而結姻本就具有人質之意味，故盧弼便認為：「董卓令孫堅列疏子弟仕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曹操不能制孫策，乃與之結親，而禮辟其弟。孫權畏劉備之強，進妹固好。權奸心事，大略相同。」<sup>80</sup>不過《江表傳》曾記載孫吳將軍朱治勸諫孫賁之語，藉此可以窺知江東地區對於孫氏家族的認同意識：

破虜將軍（孫堅）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孫策）繼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為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為遠近所瞻。加討虜（孫權）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眾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漢光武帝）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關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為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sup>81</sup>

<sup>77</sup>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清·嚴可均（1762-1843）輯，苑育新審定：《全宋文》（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 153-154。

<sup>78</sup> 《三國志》卷 56《吳書·朱治傳》。見《三國志》，頁 1304。

<sup>79</sup>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討逆傳》。見《三國志》，頁 1104。

<sup>80</sup> 《三國志集解》，頁 2873。

<sup>81</sup> 《三國志》卷 56《吳書·朱治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304。

朱治不但是江東本地人氏，且自孫堅時代即跟隨其南征北討，也是輔翼孫策攻占吳郡之重臣，當孫權初繼父兄之業時，朱治也於第一時間與張昭同時輔政，並隨即被任命為吳郡太守，而此段歷史在《陳志》中僅記朱治勸說惴惴不安的孫賁，並沒有仔細說明朱治陳安危之具體內容，但藉由《江表傳》的記載，朱治強化了當時北方軍閥同室操戈與手足亂倫之慘景<sup>82</sup>，來提醒孫賁明白真正大敵為北方挾帝篡漢之曹操，切勿聯合外人反戈孫氏同宗，更不要輕易放棄孫堅先祖辛苦打下的半壁江山，最重要的則是再度提示孫氏政權與應運東南的政治傳說有著密切關係。<sup>83</sup>從其所言可知，江東士人對於孫氏政權的認同感與日俱增，朱治將孫權與劉秀對比，不僅有攀附東漢正統性之心跡，也意味日後吳人對孫權稱帝乃時運所致：「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sup>84</sup>的立場。

又如黃武 2 年 (223)《江表傳》曾記載：「權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sup>85</sup>這是有關禘祭大典的時間制定：「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原注：言祭宗廟，旁祭五祀，蓋同一日，自此而始，非舊典。)」<sup>86</sup>可知禘祭乃年終歲末的國家祭祀大典。不過黃武 2 年孫權尚未稱帝，《江表傳》即載有孫權拒絕群臣擁護其稱帝建國之事：

權辭讓曰：「漢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

<sup>82</sup> 如劉表 (?-208) 曾分遺袁譚 (?-205)、袁尚 (?-207) 勸和之書信，喻其：「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三國志》卷 6《魏書·袁紹傳注》。見《三國志》，頁 203。

<sup>83</sup> 「應運東南」的傳說係始自秦始皇時代的預言，流傳至三國時已強化為一種爭奪正統的意象。前者可見《史記》卷 8《高祖本紀》：「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見《史記》，頁 348。後者如陳壽所記周瑜對魯肅言：「今主人（孫權）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曆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見《三國志》卷 54《吳書·魯肅傳》，頁 1268。又如《裴注》所引韋昭《吳書》記趙諮對孫權語：「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見《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注》，頁 1123。

<sup>84</sup>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討逆傳》。見《三國志》，頁 1109。

<sup>85</sup>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129。

<sup>86</sup> 《通典》卷 44《吉禮三》。唐·杜佑 (734-812) 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1238。

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選眾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sup>87</sup>

此事與上述孫權決定臘祭時間幾乎同時，但即使孫權稱帝還在六年後的黃龍元年（229），不過從《江表傳》可知：一方面孫權已經著手頒布國家祭典的詔令，另一方面江東士民已經出現擁護孫權稱帝的意見，可知江東地區早已瀰漫對孫吳政權之認同感。但孫權認為自己得命於土行，故應於孟冬十月的未日與辰日分別舉行祭祖與臘祭的典禮，此事雖然遭到東晉（317-420）虞喜的質疑，認為孫權誤解曆法而錯亂祭祖的時間<sup>88</sup>，但從《江表傳》的內容實可感受江東百姓對建立孫吳政權並不排斥。故當嘉禾元年（232）孫吳建國第四年時，《江表傳》記載孫吳群臣提醒孫權舉行郊祀大典之事：

是冬，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脩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家。昔周文、武郊於鄠、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於鄠，見何經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長安，言文王郊於鄠。」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sup>89</sup>

從《江表傳》的內容可知東吳群臣認為不但祥瑞屢至，另外又有遼東公孫淵的慕義稱臣，故正可藉祭天之舉宣揚國威，以符天啟。但孫權竟兩次婉拒，理由之一是父兄的祖廟未在建康，其次則謙稱自己僅稱霸江東，國勢尚未擴展至「土中」，即天下的中心，故不宜行此天下共主之禮。但《江表傳》所言也令後世史家抓到一再嘲諷

<sup>87</sup> 《三國志》卷47《吳書·吳主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1130。

<sup>88</sup> 《三國志》卷47《吳書·吳主傳注》引虞喜（281-356）《志林》：「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盛於戌，而以未祖，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祀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見《三國志》，頁1130。

<sup>89</sup> 《三國志》卷47《吳書·吳主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1136。

孫權的把柄，如趙一清云：「嘉禾初，群臣奏宜郊祀，又弗許。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且三江、衡霍、會稽，皆在吳、楚之望，亦不見秩，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sup>90</sup>顯然譏諷孫權偏信淫祠而不重正祀，何焯也說：「仲謀既自擅尊號，以天子臨其臣民，而不修郊祀，是子不事父，野哉。」<sup>91</sup>則使孫權粗疏無禮、忠孝兩失。但若仔細考慮《江表傳》在三國史中的位置，其專美吳國之用心與筆韻顯然應該不會認同清儒等人的解讀結果，再參照同一年《陳志》僅記載遼東公孫淵稱藩於孫權<sup>92</sup>，前一年則雖有嘉禾祥瑞但戰事皆墨：

（黃龍）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sup>93</sup>

從陳壽之敘史方式很難不讓人聯想成孫權因為對外戰事受挫才不斷製造出「嘉禾生」之祥瑞來鞏固威信，但相較於《江表傳》所描述眾臣擁戴之景狀，並認為孫權即使未征服中原也已是天下之主，才會有嘉禾生等重要祥瑞不斷出現，再三證明《江表傳》述史立場實極度偏袒孫吳政權，如此也就能理解何以裴松之認為三國史料皆具有「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sup>94</sup>之特性。

#### 四、《江表傳》擁吳仇蜀之立場 對書寫「赤壁之戰」之影響

<sup>90</sup> 《三國志集解》，頁 2943。

<sup>91</sup> 《三國志集解》，頁 2944。

<sup>92</sup>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閩中令孫綜稱藩於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見《三國志》，頁 1136。

<sup>93</sup>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見《三國志》，頁 1136。

<sup>94</sup> 《三國志》卷 54《吳書·魯肅傳注》。見《三國志》，頁 1269。

## （一）《江表傳》對「赤壁之戰」的刻意渲染

而最能凝聚江東意識及國家認同的歷史事件莫過於建安 13 年的赤壁之戰。有關赤壁之戰的過程及真相，在《三國志》中，始終是魏、蜀、吳三家各自站在於已有利的立場分別表述，於是形成中國戰爭史上最早的羅生門。<sup>95</sup>由於曹魏是此一戰役最大的輸家，且為曹操最大的隱痛，因此最好的方法即是對此一戰役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如《武帝紀》中所云：「（曹）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sup>96</sup>僅短短數十字；而劉備係此役最大的受益者，故時時有邀功之筆。先有孔明（181-234）獻策於孫權：

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徧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sup>97</sup>

後有劉備（161-223）的大破曹軍：

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sup>98</sup>

尤其在《龐統傳》中還出現「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sup>99</sup>一語，顯然陳壽有意悄悄將赤壁之戰的主導權過渡給劉備，也造成日後在《山陽公載記》中對火燒曹艦之功歸屬先主的記載。<sup>100</sup>

<sup>95</sup> 有關「赤壁之戰」魏、蜀、吳三方史料孰重孰輕，可參張大可〈赤壁之戰考辨〉的研究。見氏著：《三國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頁 78-90。

<sup>96</sup> 《三國志》卷 1《魏書·武帝紀》。見《三國志》，頁 31。

<sup>97</sup> 《三國志》卷 35《蜀書·諸葛亮傳》。見《三國志》，頁 915。

<sup>98</sup> 《三國志》卷 32《蜀書·先主傳》。見《三國志》，頁 878。

<sup>99</sup> 《三國志》卷 37《蜀書·龐統傳》。見《三國志》，頁 953。

<sup>100</sup> 《三國志》卷 1《魏書·武帝紀注》引《山陽公載記》曰：「（曹）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

相對於上文的描述，《江表傳》對於赤壁之戰的記載實以勝利者的姿態，對戰役的原始本末詳加敘錄，首先是曹操「方與將軍會獵於吳」<sup>101</sup>的挑釁戰書，其次便是孫權主動遣魯肅促成孫、劉聯盟：「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令與備相結。」<sup>102</sup>而後則是周瑜對戰事的胸有成竹：「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sup>103</sup>最後則是孫權的乾坤一擲：

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曹）操者，與此案同！」……權撫（周瑜）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sup>104</sup>

至於黃蓋火攻曹艦乙事，《江表傳》也詳細記載其過程。先是黃蓋詐降以誘曹操輕敵：「曹公特見行人（黃蓋），密問之，口敕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sup>105</sup>，待其上當後驟然施行火燒連環之計：

至戰日，（黃）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眾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柴。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sup>106</sup>

顯然吳人對此出奇制勝的戰績津津樂道，且始終認為周瑜等將士才是真正擊敗曹操

---

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見《三國志》，頁 31。

<sup>101</sup>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118。

<sup>102</sup> 《三國志》卷 32《蜀書·先主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878。

<sup>103</sup> 《三國志》卷 54《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262。

<sup>104</sup> 《三國志》卷 54《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262。

<sup>105</sup> 《三國志》卷 54《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263。

<sup>106</sup> 《三國志》卷 54《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263。



的關鍵主力，故曹操以傳染病為藉口、劉備欲藉聯盟之名以奪首功相比<sup>107</sup>，《江表傳》則鉅細靡遺地鋪陳戰況，竭力恢復戰場實景，不僅強化了其真實度，相對也無形中提高東吳在此役中的彪炳戰功。

《江表傳》除不斷強調東吳在赤壁之戰的主導地位外，更藉此形塑周瑜與魯肅的建國英雄形象，如：

（曹）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間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蒿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sup>108</sup>

這是周瑜對於赤壁戰前的戰略分析，指出曹軍在出師正當性立腳不穩；而曹操本有內憂外患夾攻；又其戰線過長，兵疲馬乏；最重要的是北兵不習水戰，根本是自投羅網。孫權接納周瑜意見，實際上也是其對國是定調的關鍵。而魯肅除替孫權擬定鼎足江東之策外<sup>109</sup>，日後更是周瑜親自指定接班人，《江表傳》稱其：「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sup>110</sup>這兩人皆是赤壁大捷之功臣。尤其是周瑜功蓋群雄，故孫權於凱旋開宴慶祝時便歸功於公瑾：

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為非也。<sup>111</sup>

<sup>107</sup>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見《三國志》，頁 1118。

<sup>108</sup> 《三國志》卷 54《吳書·周瑜傳》。見《三國志》，頁 1261-1262。

<sup>109</sup> 《三國志》卷 54《吳書·魯肅傳》載：「肅對（孫權）曰：『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見《三國志》，頁 1268-1269。

<sup>110</sup> 《三國志》卷 54《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271。

<sup>111</sup> 《三國志》卷 52《吳書·張昭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222。

便指出若無周瑜指揮若定，檣櫓灰飛湮滅者或許是江東自身。而《江表傳》之語實也代表著吳人支持主戰的態度，更顯示出周瑜在國策制定上的重要地位。

因此後世所流傳周瑜名士風流之形象，其實大部分來自於《江表傳》的資料中，如謙恭好禮：「(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普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sup>112</sup>或風流倜儻：「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sup>113</sup>甚至震懾北使蔣幹：

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sup>114</sup>

周瑜一語道破蔣幹所負任務，又大方展示孫權壯盛之軍容，使蔣幹非但未能執行策反任務，反倒傾服於公瑾風範：「(蔣)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閒。」<sup>115</sup>但在後世演義系統中，周瑜卻總是心胸狹隘地欲置孔明於死地，在《江表傳》中周瑜卻成為敵國處心積慮抹黑陷害之指標：

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sup>116</sup>

劉備綿裡藏針之語欲離間孫權對周瑜的信任；曹操則以瘟疫為藉口掩飾於赤壁敗給周瑜的不甘，俱顯示出當時周瑜威名遠播，敵國乃想盡辦法要摧毀其英雄神話，但在《江表傳》中則強化並渲染江東士民對周瑜崇拜的情緒。故孫權自道：「公瑾雄烈，

112 《三國志》卷 54《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265。

113 《三國志》卷 46《吳書·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101。

114 《三國志》卷 54《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265。

115 《三國志》卷 54《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265。

116 《三國志》卷 54《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 1265。

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sup>117</sup>可說是對周瑜在孫吳建國英雄譜上的定調，日後當陸機（261-303）回顧江東霸業時便指出：

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眾，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sup>118</sup>

透露出即使亡國後，吳人仍將周瑜視為整個國族的英雄記憶，即使山河易主後，也始終是維繫江東士民自我認同的重要符號。

## （二）「借荊州」公案與《江表傳》之仇蜀心態

「荊州之爭」是孫、劉衝突最重要之導火線。而「借荊州」則是凡對三國史稍有涉獵者都熟稔的事件，《三國志通俗演義》自赤壁之戰後的情節鋪演，也幾乎完全由孫、劉兩家「搶荊州」、「借荊州」、「討荊州」、「還荊州」、「失荊州」的脈絡而發展，最後成為人人琅琅上口的套語。但「借荊州」其實是孫吳為了與蜀漢搶奪荊州一地所提出的藉口，因為在陳壽在《蜀志》中其實始終避免「借荊州」的字眼，僅云：「（建安）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sup>119</sup>顯然《陳志》用的是「相與」而非「歸還」，就蜀國立場而言荊州一地根本無關借貸，但孫吳似乎總有藉口向劉備索討荊州，而《江表傳》正是對此著墨最力之江東文獻。

赤壁戰後荊州實遭曹操、劉備、孫權三方勢力共管，《吳主傳》載：

（劉）備、（周）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建安）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孫）權以瑜為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荊州

<sup>117</sup> 《三國志》卷 54《吳書·呂蒙傳》。見《三國志》，頁 1280。

<sup>118</sup> 西晉·陸機：〈辨亡論〉。見劉運好校注：《陸士衡文集校注》冊下（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頁 989。

<sup>119</sup> 《三國志》卷 32《蜀書·先主傳》。見《三國志》，頁 883。

牧，屯公安。<sup>120</sup>

大敗北歸的曹軍並未完全退出荊州，仍有樂進（?-218）力守襄陽；而周瑜在與曹仁僵持一年後艱苦地攻下江陵，使孫權擁有江夏、南郡二地；但真正據有荊州大部分土地者則是劉備，陳壽在《先主傳》中即曰：

先主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雷緒帥不取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sup>121</sup>

足見劉備乃自食其力打下荊州四郡<sup>122</sup>，《諸葛亮傳》亦言：「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sup>123</sup>可見劉備早已有計畫地逐步控制荊州南部。然孫權眼見劉備羽翼漸成，又兵屯南郡南岸的公安<sup>124</sup>，再加上荊州南部四郡盡入其掌握，實已悄悄轉變了孫、劉聯盟的實力天秤，而此正是埋下日後孫、劉爭奪荊州的導火線。

然「借荊州」一事在孫、劉雙方實皆各自表述，如《魯肅傳》云：「後（劉）備謁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sup>125</sup>魯肅借地的建議乃著眼於建立孫、劉聯合抗曹的防線，助孫權舒緩自建康至南郡縣長的補給壓力，並藉劉備之力來抵擋曹軍之進攻；但此舉卻令曹操大為震驚，無法相信孫權竟會輕易放棄戰略要地的南郡。前此周瑜便指出：「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劉、關、張），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sup>126</sup>可見「割南郡」一事在孫權陣營內所造成的歧見，然若孫權不放棄

<sup>120</sup> 《三國志》卷 47《吳書·吳主傳》。見《三國志》，頁 1118。

<sup>121</sup> 《三國志》卷 32《蜀書·先主傳》。見《三國志》，頁 879。

<sup>122</sup> 馬植杰（1922-2006）即斷言：「當時吳國流傳著劉備向孫權借荊州的說法，實際上荊州的江南四郡，是劉備自己取得的。」見氏著：《三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 70。

<sup>123</sup> 《三國志》卷 35《蜀書·諸葛亮傳》。見《三國志》，頁 915。

<sup>124</sup> 《通典》卷 183《州郡志·古荊州·江陵郡》：「公安。漢作唐縣，故城在西，亦二漢孱陵縣地。後漢末，劉備為荊州牧，鎮油口，即此。」見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頁 4865。

<sup>125</sup> 《三國志》卷 54《吳書·魯肅傳》。見《三國志》，頁 1270-1271。

<sup>126</sup> 《三國志》卷 54《吳書·周瑜傳》。見《三國志》，頁 1264。

南郡則必處腹背受敵之劣勢<sup>127</sup>，故在周瑜暴卒後：「（孫）權分荊州與劉備。」<sup>128</sup>可見孫權也接受魯肅建議放棄南郡，但在《陳志》行文中，始終未見有「借」字。

唯一一次出現「借荊州」之語者，乃是專美吳國的《江表傳》，且將借貸範圍擴大成「借荊州數郡」：

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為公安。劉表吏士見從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復從權借荊州數郡。<sup>129</sup>

何焯雖早已看穿其中虛實：「若從權借者，安得自表琦領州事乎？亦《江表傳》大言也。」<sup>130</sup>其中最重要的是：將「借南郡」一郡悄悄地延伸為「荊州數郡」，而後再漫無止境地擴大成整個「荊州」，故本人認為此乃歷史上「借荊州」公案之由來始末。

### （三）赤壁之戰前夕劉備軍屯「夏口」或「樊口」之辨

《江表傳》除了捏造劉備為求安頓部眾而向周瑜開口借地外，還刻意模糊劉備於赤壁戰前與孫權結盟時的駐軍地點。據《陳志》可知劉備當初為躲避曹操追殺遂攜荊州百姓及其部眾一路南逃，至夏口與劉表長子劉琦會合，故《先主傳》曰：

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眾輜重。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sup>131</sup>

可知劉備早在與魯肅見面前即已抵達夏口，也才有「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一事，而《陳志》亦有多處記載劉備駐軍夏口的事實，如《武帝紀》：「（建安十三年）

<sup>127</sup> 張大可於〈論孫吳儒將〉一文有詳細分析魯肅建議借地的戰略考量，參氏著：《三國史研究》，頁240-246。

<sup>128</sup> 《三國志》卷55《吳書·程普傳》。見《三國志》，頁1264。

<sup>129</sup> 《三國志》卷32《蜀書·先主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879。

<sup>130</sup> 清·何焯撰，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冊中，頁460。

<sup>131</sup> 《三國志》卷32《蜀書·先主傳》。見《三國志》，頁878。

九月，公到新野，(劉)琮遂降，備走夏口。」<sup>132</sup>《劉表傳》：「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sup>133</sup>《諸葛亮傳》：「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sup>134</sup>《關羽傳》：「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sup>135</sup>東晉王隱的《蜀記》也說：

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眾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在夏口，飄颻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邪！」<sup>136</sup>

裴松之認為王隱書中的故事完全子虛烏有，劉備是董昭〈衣帶詔〉政變謀畫者之一，怎麼可能發出為國惜才而不忍殺害要挾天子之國賊曹操呢？故王隱所言完全是向壁造虛，但王隱也將故事地點定在夏口，則可見至東晉時期對於劉備於赤壁戰前駐軍夏口之事是沒有異議的。而陳壽也一再提及劉備當時駐在夏口，如《吳主傳》：「劉備欲南濟江，(魯)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為陳成敗。備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sup>137</sup>《周瑜傳》：「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平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sup>138</sup>《魯肅傳》：「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sup>139</sup>由以上文獻的一致性，可見劉備於赤壁戰前駐軍夏口似乎毫無疑義了，但對此事唯一出現不同記載的即是以專美吳國為職志之《江表傳》：

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

<sup>132</sup> 《三國志》卷1《魏書·武帝紀》。見《三國志》，頁30。

<sup>133</sup> 《三國志》卷6《魏書·劉表傳》。見《三國志》，頁214。

<sup>134</sup> 《三國志》卷35《蜀書·諸葛亮傳》。見《三國志》，頁915。

<sup>135</sup> 《三國志》卷36《蜀書·關羽傳》。見《三國志》，頁940。

<sup>136</sup> 《三國志》卷36《蜀書·關羽傳注》引王隱《蜀記》。見《三國志》，頁940。

<sup>137</sup> 《三國志》卷47《吳書·吳主傳》。見《三國志》，頁1117。

<sup>138</sup> 《三國志》卷54《吳書·周瑜傳》。見《三國志》，頁1262。

<sup>139</sup> 《三國志》卷54《吳書·魯肅傳》。見《三國志》，頁1269。

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未肯係瑜，蓋為進退之計也。<sup>140</sup>

「夏口」與「樊口」分處今漢水鄂縣的南北兩岸，雖然同樣位於荊州境內，但在赤壁戰前已經出現孫、劉分治的情勢。據《水經·沔水注》：「揚水又北注於沔，謂之揚口、中夏口也。曹太祖之追劉備於當陽也，張飛按矛於長坂，備得與數騎斜趨漢津，遂濟夏口是也。」<sup>141</sup>可知夏口正是劉備逃脫曹操追擊之地，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引應劭謂其位置於「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sup>142</sup>至於樊口的位置據胡三省（1230-1302）所言：「《水經注》江水過鄂縣北而東流，右得樊口樊山下，寒溪水所注也。」<sup>143</sup>則可知樊口在鄂縣之東，《後漢書》卷22《郡國志》「荊州」條下之「江夏郡」載錄有「鄂縣」<sup>144</sup>，顯然樊口所在之處乃在鄂縣夏口以東，兩地隔江相對，為孫吳所據有。

前引史料均已確認赤壁之戰前劉備係兵屯夏口，唯《江表傳》刻意獨標劉備兵屯樊口，箇中差異雖已有學者注意到《江表傳》在敘述劉備屯軍處的不合理性，如盧弼考證可知赤壁戰前孫權的勢力實還未越過漢水至江夏郡北區：

《魏志·文聘傳》：「聘為江夏太守，屯沔口。」《吳志·魯肅傳》：「肅子淑為夏口督。」胡三省謂自孫權置夏口督，屯江南，而江北之夏口晦。諸葛亮曰：「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此數語於當日情勢，最為瞭然。故沔北之安陸、新市、雲杜、竟陵、黃武皆入

<sup>140</sup> 《三國志》卷32《蜀書·先主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878。

<sup>141</sup> 參北魏·酈道元（?-527）注，清·楊守敬（1839-1914）、熊會貞（1863-1936）疏，段熙仲（1897-1987）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冊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頁2412。

<sup>142</sup> 《漢書》卷28《地理志上注》。見《漢書》，頁1567。

<sup>143</sup> 《資治通鑑》卷65《漢紀·孝獻皇帝·建安十三年》。參北宋·司馬光（1019-1086）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2088。

<sup>144</sup> 《後漢書》，頁3482。

魏，與魏以漢水為界。<sup>145</sup>

但《江表傳》卻記載魯肅勸劉備渡過漢水前往樊口屯紮：

（魯肅）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乎？」備大喜，進住鄂縣，即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sup>146</sup>

此外還有葛楚英也說到了《江表傳》載劉備兵屯樊口的不合情理處：

《三國志》中沒有任何一處寫到劉備先到夏口再由夏口到樊口；《江表傳》也沒有寫劉備在到樊口之前是由夏口出發的。顯然，這二者之間，有一對一錯。……兩相比較，我認為陳壽的記載是最可信的。一是因為它是正史，年代最早，二是因為它對赤壁之戰有多處記載，前後統一，合乎事理。如果劉備是先到夏口，後來又因故轉到鄂縣的樊口，然後再從樊口動身，逆流而上，與曹操遇於赤壁，作為當代人修當代史的陳壽，竟然漏掉了這麼大的歷史事件，那是不可想像的。<sup>147</sup>

而後張靖龍在《赤壁之戰研究》中也觸及此項議題：

從史料辨析的角度看，《江表傳》「樊口」之說，既與《三國志》、《後漢紀》、范曄《後漢書》等多家觀點相衝突，又無其他可靠史料作為旁證，孤證難以成立……夏口乃劉琦之地盤，劉備、劉琦在荊州內部屬於同一個利益集團，長期以來，雙方關係非同一般；自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末孫策西征黃祖以來，東吳勢力西進，逐漸侵入江夏郡境，樊口一帶已經在孫吳的控制之下。當時，孫、劉雙方有關聯合拒曹的設想，還在談判階段，尚未達成協議；劉備匆匆率軍移駐樊口，寄人籬下，主動依附，不獨示之以弱，在未來的聯合體中處於僕從地位，而且非常危險：年前，袁尚、袁熙兵敗奔走遼東投公孫康，其腦袋卻被公孫康作為人情獻給曹操。如今東吳內部和、戰兩派觀點相

<sup>145</sup> 《三國志集解》，頁122-123。

<sup>146</sup> 《三國志》卷32《蜀書·先主傳注》引《江表傳》。見《三國志》，頁878-879。

<sup>147</sup> 葛楚英：〈《三國志》中的「赤壁」及其他〉，收入吳孝貴主編：《古戰場蒲圻赤壁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頁61-62。



持不下，孫權君臣舉棋不定，正在觀望成敗之際，劉備便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東吳去處置，也不夠理性。<sup>148</sup>

前引諸人雖皆已注意到《江表傳》記載劉備兵屯樊口的不符史實與違背當時戰略布局之處<sup>149</sup>，但均未察覺《江表傳》為何要如此捏造劉備屯軍處的確切理由。事實上一旦落實劉備係駐軍於樊口，則暗示劉備顯係孫權所轄之部將。而赤壁之戰理當成為孫權獨力與曹操對決的勝負，間接削弱劉備在此戰役中的戰績與貢獻。再推衍下去，荊州的主權，當然歸屬於孫吳，劉備不得與之，爾後「借荊州」、「討荊州」當然振振有詞。換言之《江表傳》塑造劉備駐軍樊口說的目的，其實仍然是前文「借荊州」系列事件的呼應與強化。如果治史者未能察覺箇中奧妙，恐怕就著了《江表傳》「專美吳國」的陷阱而不自知。

## 五、結論

經上文整理可知：《江表傳》實存有強烈偏袒吳國的意識，不僅對孫氏父子的造型加以推崇美化，也強調吳國應運東南之天命觀，除此之外，在赤壁之戰中對周瑜、魯肅等吳國將領之功績亦稱頌不已。

至於《江表傳》苦心擘畫「荊州之爭」，則是完全為了防止劉備坐大的外交戰，從赤壁戰前劉備之駐軍地到赤壁戰後的防線布局，處處可見《江表傳》為替孫吳政權宣示荊州主權之苦心，無論是王懋竑：「《江表傳》所云以地給備，及備借荊州數郡之語，皆傳聞之妄，不足據也。」<sup>150</sup>還是趙翼（1727-1814）：「吳人追思赤壁之役，實藉吳兵力，遂謂荊州應為吳有，而備據之，始有借荊州之說。」<sup>151</sup>雖都已經駁斥

<sup>148</sup> 張靖龍：《赤壁之戰研究》（開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頁 179-183。

<sup>149</sup> 朱子彥：《走下聖壇的諸葛亮——三國史新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 203-205。  
不過朱氏所論多承自張靖龍的研究啟發。

<sup>150</sup> 《三國志集解》，頁 2351-2352。

<sup>151</sup> 清·趙翼著，王樹民（1911-2004）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冊上（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 140。

《江表傳》對荊州之爭渲染之虛妄，卻並沒有指出《江表傳》所暗藏專美吳國之敘史立場，此一歷史懸案日後也成為小說家「借荊州」的故事來源，不過讀者們卻多忽略掀起風波的濫觴所在，居然完全是由擁護孫吳立場的《江表傳》而來。因此《江表傳》所陳述劉備佔地不還的荒謬理由，實也代表吳國士民對其無賴性格的裁臧，不僅表示吳人強烈的仇蜀心態，也急欲藉此襯示孫權泱泱君子之氣度，進而與劉備出爾反爾的窘態相互對照。

雖然《江表傳》為孫盛責斥「多為吳人欲專美之詞」，但是就史學理論而言，所有的歷史敘述，本就夾帶敘史者自身的偏執。重要的是：後代史學家在檢視及引用各項歷史文獻前，本該具有這項認知與防範心，方可在諸多史籍紛紜並陳之下，找出其湮沒在眾聲喧嘩中的密碼。《裴注》所引的各項史書，本就有各自的敘述立場，如魚豢《魏略》、王沈《魏書》顯係替曹魏政權發言<sup>152</sup>，習鑿齒《漢晉春秋》則首揭蜀漢正統之大旗，而韋昭《吳書》、胡沖《吳歷》、張勃《吳錄》及本文主題所論之《江表傳》，顯係替南方孫吳發言。<sup>153</sup>治三國史之學者在引證《裴注》所引之書以證其說之前，不得不慎之耳！

<sup>152</sup> 參拙著：〈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中國學術年刊》33（2011.6），頁1-34。

<sup>153</sup> 參拙著：〈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兩種讀法〉，發表於「林文月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13.9.5-6），頁113-142。

## 引用書目

### 一、原典文獻

- 東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臺北：明文書局，1988。
- \*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
-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 南朝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清·胡克家考異，李培南等點校：《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2003。
- \* 北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97。
- \*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批評，孟昭連等校點：《三國演義》，長沙：岳麓書社，2006。
-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1。
- 清·何焯撰，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清·嚴可均輯，苑育新審定：《全宋文》，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清·李慈銘著，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劉運好校注：《陸士衡文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 \* 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8。

## 二、近人論著

- \* 王文進：〈論魚豢《魏略》的三國史圖像〉，《中國學術年刊》33(2011.6)，頁 1-34。
- \* 王文進：〈論王沈《魏書》對三國史的詮釋立場〉，發表於「第 14 屆『社會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12.5.4-5。
- \* 王文進：〈習鑿齒與諸葛亮神話之締造〉，《臺大中文學報》38(2012.9)，頁 71-120。
- \* 王文進：〈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裴松之《三國志注》的兩種讀法〉，發表於「林文月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13.9.5-6，頁 113-142。
- 王永平：《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王建國：〈孫盛若干生平事迹及著述考辨〉，《洛陽師範學院學報》3(2006)，頁 71-73。
- 方詩銘：《方詩銘論三國人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朱子彥：《走下聖壇的諸葛亮——三國史新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 \* 李純蛟：《《三國志》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
- 余志挺：《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 吳孝貴主編：《古戰場蒲圻赤壁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 吳直雄：〈習鑿齒及其相關問題考辨〉，《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0：4(2009.7)，頁 74-80。
- 馬植杰：《三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陳楠：〈淺論《三國志注》的歷史文獻學價值〉，《山東圖書館季刊》3(2008.9)，頁 91-95。
- 張大可：《三國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
- 張靖龍：《赤壁之戰研究》，開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 遼耀東：《魏晉史學的思想及社會基礎》，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 羅秉英：《治史心裁：羅秉英文集》，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5。

劉節：《中國史學史稿》，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

繆越：《讀史存稿》，香港：三聯書店，1978。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Jin] Chen Shou, *San Guo Zhi*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 Annotated by Pei, Song-z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1997.
- [Song of Southern Dynasties] Fan Ye, *Hou Han Shu* (History of Eastern Han). Annotated by Li X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1997.
- Li, Chun-Jiao, *San Guo Zhi Yan Jiu* (The Research of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 Chengdu: BaShu Book Co., 2002.
- Lu Bi, *San Guo Zhi Ji Jie* (Commentary to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 Edited by Qian, Jian -Fu.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Work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Ming] Luo, Guan-Zhong, *San Guo Yan Yi*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notated by Mao, Zong-Gang and Meng Zhao-Lian etc. Chang Sha: YueLu Book Co., 2006.
- [Song of Northern Dynasties] Si Ma Guang, *Zi Zhi Tong Jian* (History as a Mirror). Annotated by Hu, San-X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1997.
- Wang, W. -J., “Lun Yu Huan ‘Wei Lue’ de San Guo Shi Tuxiang” (How do Yu Huan Construction’s the Three Kingdoms History Image in His Book Weilue (or Brief Account of the Wei Dynasty), *Studies in Sinology* 33(2011), pp.1-34.
- Wang W. -J., “Lun Wang-Shen ‘Wei Shu’ dui San Guo Shi de Quanshi Lichang” (The Discussion on the St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History In the Wang-Shen “Wei Manual”), in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ety and Cultu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ipei: Tamkang University, 2012.
- Wang W. -J., “Xi Zaochi yu Zhuge Liang Shenhua zhi Dizao” (Xi Zaoch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yth of Zhuge Li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38(2012), pp.71-120.
- Wang W. -J., “San Guo Shi de Jiegou yu Chongjian -- Pei Songzhi ‘San Guo Zhi Zhu’ de Liangzhong Dufa” (Deconstruction and Rebuilding of Three Kingdoms History: Two Kinds of The Discussion on Pei Songzhi’s Comment of The Book Records of Three Kingdom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r. Lin Wen-Yue’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Legacy,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13), pp.113-142.